

克里斯蒂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符号学 解读*

张 颖

摘 要: 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是追溯意义的萌芽和生成过程的符号学, 以超语言学的意义生成装置即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它以反抗传统符号学理论的过分秩序化和理据化为旨归, 具有明显的革命性和先锋性。生产、劳动与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直接影响了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理论的建构。本论文通过考察克里斯蒂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劳动和实践的符号学解读, 重点讨论意义生成 (signifiante) 和意指实践 (pratique signifiante) 的过程。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克里斯蒂娃 符号学 意义生成 意指实践

On Julia Kristeva's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Zhang Ying

Abstract: Julia Kristeva's *sémanalyse*, which aims to overturn the over-ordering and over-motivation of traditional semiotics, focus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ext and highlights the emergence and generative process of signification. Kristeva's semiotics has apparent and distinctive revolutionary demands, due to the indispensable role that Marxist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结构-后结构主义运动中的克里斯蒂娃研究”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16CWW001。

political economics played in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creative reading of Marxism that Kristeva used as her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base that was elucidat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On the one hand, the overview tracks the evolution from Marx's concepts of production and labour to Kristeva's significance. On the other hand, how Kristeva developed her practice theory from Marx's views on practice is discussed in detail.

Keyword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Julia Kristeva, semiotics, significance, pratique signifiante

DOI: 10.13760/b.cnki.sam.201602006

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不以语言本身的系统和结构为关注点，而是跳出语言学模式的范畴，用超语言学的方法来观照不同文本的特定运作模式，研究意义从萌芽到生成的动态生成过程。此时，意义生成活动取代意义成为其符号学理论的核心，而实践被看成是一种意指活动，语言系统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她所倾向于理解的意指实践成为了一种异质要素对抗的过程。无论是她符号学理论早期的现象文本与生成文本两种文本类型，还是她在将精神分析学理论引入后提出的符号态与象征态两种模态，无不是在说明这种动态的意义生成过程。

在她的理论建构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称《巴黎手稿》）中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讨论“异化劳动”，为共产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重点关注生产，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恰好是这两个文本之间的过渡。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所使用的实践一词主要是指在哲学家解释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改造世界的广大领域。生产、劳动与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直接影响了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理论的建构，具体表现在意义生成和意指实践两个方面。而讨论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解读，将有助于认识克里斯蒂娃的思想进路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扮演的角色，同时理清她在理论建构中的理论借用所呈现出的革命的诉求和反抗的姿态。

鉴于此，本论文的论述将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关注克里斯蒂娃如何通过借用马克思的劳动观和生产观来讨论非具象的、先于价值和意义的生产和劳动，并提出意义生成概念的；另一方面，分析克里斯蒂娃对马克思实践

观的解读，并理清她提出的意指实践的两种类型（社会实践和文本实践）的不同侧重点。

一、从劳动与生产到意义生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注劳动，探索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这是青年马克思第一次尝试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的文本。手稿分为三个部分：在“笔记本Ⅰ”中，马克思通过对工资、资本的利润以及地租的分析，揭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对立的经济根源。随后他提出异化劳动的理论，阐释异化劳动的几个基本特征。

在讨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时，马克思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是相对立的。劳动的产品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1995，pp. 267 - 268）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马克思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矛盾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核心矛盾来加以批判。“笔记本Ⅱ”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在“笔记本Ⅲ”中，马克思提出扬弃异化的现实路径，即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关资本的生产过程，着重讨论了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围绕着劳动引申出关于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讨论。有关劳动与价值的关系，价值指向具体的价值实体或者价值量，而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是在商品的交换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任何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劳动，这种劳动是有用的，是人类为实现某种目的，满足某种需要，通过对自然物质的加工而实现的。由是，马克思所谓的劳动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995，p. 56）。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的关系，则是另一种抽象的关系。价值是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表现在商品中是其所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因此，马克思下结论为：“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损耗；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1995，p. 60）

马克思对商品的使用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可以简单归纳为几

点：1. 具体的有用的人类劳动生产使用价值；2. 无差别的抽象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形成商品价值；3. 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必然表现方式；4. 物必须要有使用价值，才能形成价值，另外，如果物没有使用价值，它所包含的劳动没有用，就不形成价值。

克里斯蒂娃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劳动论的借鉴，正是从劳动与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角度出发所进行的纯粹个人化的解读。克里斯蒂娃认为马克思在研究劳动问题本身和区分不同的劳动概念时，是从流通观点出发的。而流通分为两种，即某种实体的流通和某种价值的流通，前者的劳动是具体的，后者的劳动是抽象的。“（马克思认为）劳动总是有价值的，要么是使用价值，要么是交换价值。在交换中，价值就成为劳动的一种具体化的形式，劳动除了再现这种具体化的价值之外，不能再现其它任何事物。劳动的价值只能通过它自身的价值来衡量。也就是说，根据产生这种价值所耗费的社会时间来衡量。”（1986, p. 82）

克里斯蒂娃认识到了马克思对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划分。价值以劳动力耗费经过抽象形成的劳动意识为内容，它源自生产环节劳动力的耗费，通过抽象而来。交换价值则以两种商品实物在数量上的比例关系为表现形式，它是通过交换产生的。因此，从表面上看，价值和交换价值不可能相等而成为一样的东西。但是，当对作为“表现形式”的商品的交换价值进行考察时发现，它的实际内容仍然是劳动力耗费的價值。虽然价值是出现在生产环节，而交换价值是出现在交换环节，但是从宏观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看，二者都指向劳动力耗费的價值。

此处克里斯蒂娃将马克思有关劳动的不同观点混淆在一起。她对马克思思想进行解读的切入点，是认为马克思用一种忽视“非生产性”的方式回避劳动的真正含义。马克思实质上对劳动作出了两个层面的区分：1. 马克思区分了有用劳动和无用的劳动——生产的物品是否具有使用价值，如果一个物品没有用，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没有使用价值，反之，则具有使用价值；2. 马克思将劳动区分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和具体的有用劳动，前者形成商品价值，后者形成使用价值，而作为交换价值实现方式的流通，只是商品价值的一种表现，与使用价值无关。

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属性问题的思考与黑格尔直接相关。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在讨论“有用是启蒙的基本概念”时指出：“一切东西都既是自在的又是为一个他物的，换句话说，都是有用的。”（1983, p. 97）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包括两方面的内涵，即自在的和为他物的。“自在”强调的是自我

实现，是人的生命的自在表现，是非功利的自主行为，而“为他物”强调的是劳动的有用性原则，具有工具性和功利性。

在讨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时，马克思指出：“劳动生成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1995，p. 267），这说明马克思所理解的劳动包含了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劳动生产商品是对劳动的有用性和功利性的强调；另一方面，劳动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本身和生产工人，即强调劳动本身具有内在的目的，是个体的一种生命的表现。

在界定劳动的概念时，克里斯蒂娃认为“马克思的劳动的概念，除去了生产的空间，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空间，会导致对生产概念的限定”（1986，p. 82）。此处，克里斯蒂娃并没有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有关劳动概念的二重性的内涵，她所关注的只是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劳动的有用性和工具性的侧面，从“非生产性”的视角否定马克思的劳动观。她忽视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对劳动所体现的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内在目的的考察，而只是片面地从生产的空间本身出发分析生产的结果，并没有全面观照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的内核。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是从异化劳动的角度来透析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所存在的弊端。他所批判的是异化劳动对劳动的二重性的分裂：劳动的有用性占据主导，人的自我实现的目的被迫成为附属品。这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劳动的核心所在，而克里斯蒂娃关于有用劳动和未具体化的劳动的讨论，并未触碰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核。另外，克里斯蒂娃直接将生产的空间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空间，这个观点从逻辑上看也欠妥当，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从克里斯蒂娃的逻辑看来，就是旨在宣扬或者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空间。尽管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流通与交换的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中对于生产的忽视，就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这样一种概念的平行转换，未免有些牵强。

马克思关于生产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一部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克里斯蒂娃针对马克思的生产观提出：“马克思仅仅将生产看成是错综复杂的情况，和一种特定的决定社会或意义价值的结构，然而，他仅仅是从社会行为（或者价值）的角度去研究，由此仅仅是关于商品的交换和流通，而不是从生产本身的内部来探讨。”（1986，p. 81）克里斯蒂娃认为马克思是从社会角度，是从商品交换和循环的角度研究物质生产，而不是针对生产本身。她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批判所未能关注到的生产自身内部的问题出发，本是无可厚非。然而她的结论却过于主观和武断，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是交换和资本的规律研究……马克思将劳动作为价值来研究，并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然而，他仍然遵循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将自身限定在交换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将自身的分析建立在作为价值进入资本主义的劳动的流通产品之上。”（1986，p. 81）她将马克思对于生产自身内部的忽视，看成是马克思关注资本社会的交换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的结果，并将这一点看成是她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切入点之一，这是存在问题的。

尽管克里斯蒂娃在逻辑论证上存在着不严谨的方面，但是毋庸置疑，马克思关于劳动和生产的讨论，给克里斯蒂娃提供了一种方向。克里斯蒂娃希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建立一种非具象的生产方式，一种先于价值和意义的生产和劳动。她关注作为交换价值的劳动和劳动的生成过程，探索先于价值和意义的生产劳动，这些反映出她的理论研究的先锋特征。

克里斯蒂娃关于生产理论的预设，探究一个总体的元语言层面的生产，以及探索价值、意义产生之前的生产劳动，这一点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处在不同层面的。马克思关注的生产，是为价值的产生服务的。而克里斯蒂娃的生产，是为探索意义服务的。符号的意义，成为她探索这种元语言层面生产的依据和手段。而劳动这一概念，发展到克里斯蒂娃，其属性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层面的讨论中，劳动这一术语指称的是一种社会层次的改变，即社会生产和财富积累，强调的是使用价值的社会意义，具有明显的目的性。但是克里斯蒂娃所谓的劳动并不指称任何与社会相关的内容，指向的是去除内核的生产，它只是一种符号意识，在生产的过程中劳动作为符号来运作。劳动和生产都化约为抽象的符号，不再具有与自身相对应的实体。生产的具体目的性也消失殆尽，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没有从属关系。马克思关注的劳动所生产的商品在新的劳动观中成为一种符号流通和再生产的符码，劳动全部的历史和社会意义被剥夺，完全脱离了生产真实的内涵，只是将生产和流通的躯壳保留了下来，仅仅呈现为一整套描述特征操作。商品的交换价值逐渐取代使用价值，在整套意义系统中占据主导。而从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到克里斯蒂娃的概念生产的过程，正是生产本身与意义的指称活动合并在一起的过程。最终意义的生产活动转换成为一种能指的游戏，而游戏如何运作成为新的符号学研究的重心。

二、作为能指游戏的意义生成

马克思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文中批判了货币的交换形式对商品的价值性质的掩盖。货币的交换，使得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被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所替代。“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1995，p. 93）这段话揭示出商品的交换价值取代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危害。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品的价值，即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所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被忽视，从而使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雇佣劳动制度之下的剥削关系被掩盖，工人阶级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属性。

波德里亚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延伸到对符号体系的批判，他认为在当代社会，消费行为已经失去其原有的面貌，消费的对象，也并不是物质性的产品或者物品，消费活动成了符号的系统化操控和运作的结果。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已经逐渐消失，而成为能体现自身价值的符号。那么，人类在消费消费品时，这一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已经不再被纳入考虑范围。“这种劳动不再是原意的生产性劳动；从此它只是社会之镜，只是社会的想象，只是幻想的现实原则。”（波德里亚，2012，p. 14）

同样是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扩展到符号学研究的领域，尽管克里斯蒂娃与波德里亚在理论的具体细节处存在明显差异，但却是殊途同归。有研究者指出，“符号的定义应当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而接收的感知”（赵毅衡，2011，p. 27）。一个完整的符号表意活动，包括了符号的发出者、符号本身、符号的接收者。以语言符号为例，从符号到符号接收者的过程，是符号的表意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符号的意义，是通过交流来产生的。

正是从符号的表意活动的外在交流特性出发，克里斯蒂娃认为，它与商品交换价值的产生具有相似性。商品的交换价值则是以两种不同的商品实物在数量上的比例关系为表现形式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也是在商品成形之后的流通过程之中产生的。她认为“马克思对于交换系统的批判，与对符号和意义流通的现代批判是相似的：更重要的是，符号的批判话语承认了与货币的批判话语的相似性。”（1986，p. 83）

这种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语言符号的表意活动中，交流关系的两端是语言符号的发出者与语言符号的接收者，两者均为人类主体，符号发出者创造符号，符号接收者接受符号。正是后者结合自身经验对符号的认识

使得意义的实现成为可能。在符号的交往过程中，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符号的解释和接受表现出来。同样的，在商品的交换活动中，我们所关注的是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的主体性已经离场，与之相关的仅仅是作为销售者和购买者的人类主体。尽管商品交换必然有人的活动在内，但是这并未改变交换的实质：物物之间，或者物与货币之间的交换。论述至此，克里斯蒂娃与波德里亚以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目的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借用异曲同工，但是克里斯蒂娃的矛头一转，不再以符号系统内的差异性为切入点，而是选择了关注流通的符号产生以前的、无意义的符号生产的过程。

克里斯蒂娃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中并未提及不能具体化的劳动，那么以耗费劳动的商品为中介，这种不能具体化的劳动处于产品成形之前，与商品的交换没有关系。那么这种没有价值的劳动，同样可以在语言符号中找到相应的对应物。以语言符号为中介研究符号的表意活动，实质是研究已经成形的符号的接收和阐释的过程，那么在符号产生过程中，先于意义的，先于符号交换系统的内容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在语言符号的意义产生之前的意义的生成过程如何？论证至此，克里斯蒂娃的意图已很明显，她试图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寻找“破绽”，从而引出马克思所忽视的不可具体化为价值的、先于商品和货币流通的“另一种形式的生产（劳动）”。而这另一种形式的“生产”即克里斯蒂娃的术语中所谓的“意义生成”。在她的博士论文《诗性语言的革命》中，她指出：“‘意义生成’，准确地说，是指无限的、无尽的生成过程，是驱力（pulsions）朝向语言、在语言之中并通过语言不停歇地运作，同时朝向交换系统、在交换系统内、通过交换系统以及在主体和它的机制中持续的运作过程。”（Kristeva, 1974, p. 15）

符号的意指实践过程与符号的表意是两种异质的活动。前者是一种产生意义、使事物具有意义的实践活动，而符号的交流活动则是个人对符码运用的交流活动。我们在每一次言语活动中，都运用符合句法的语法来进行交流，从而达到沟通和传情达意的目的。而语言从无到有的过程，却是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包含着无意识的活动，与身体的能量相关。意义的生成过程研究，是在用于交流的语言系统之下的横断面之下进行的研究，通过上溯到语言起源之前，使得语言成为一种生产活动。意义萌芽于语言的内部，萌芽于语言的物质性中。克里斯蒂娃强调生产，意味着挖掘语言是如何工作的，意味着将语言表面的表意形式，与隐藏着的深层的生产方式作为并存的，异质但不冲突的两个内容完全区分开来。

□ 符号与传媒 (13)

克里斯蒂娃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不可具体化的、没有价值的劳动,移植到符号学研究的领域,转换成为意义生成之前的无限循环的过程,将这种生成的过程通过语言的能指重新排列,形成了一个产生、发展、解体、再产生,以至无穷的回路。语言的不同的能指(音和形的能指)在它的纯粹的“物质”逻辑中自我连接,相互引证,在无意识驱力的驱使下,进行自我生产。这种发生在语言生产性层面的“生产”,是一种超越价值、超越意义的生产。切开文本表层垂直面,来分析剖面不同的能指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构成能指运作的基本结构,这可以看成是对先于意义、意义开始萌芽的原初阶段的探索。同时,这种意义生成也改变了符号系统的封闭性和静止性,以表意手段的发展性和变化性为目标,为符号系统注入活力。克里斯蒂娃对意义交换体系之外的异质性的内容的强调,否定正常的语言秩序,研究存在于语言秩序之下的无序的、混乱的、断裂的成分,将有意义的符号与意义之前的符号生成过程同时都纳入到符号学研究的领域中来,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先锋性。

对于这种先于意义的,与无意识相关的能指的多样性所建立起的无边无际的意义生成空间,有学者指出它所存在的缺憾,认为“意义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是文化的积淀。意义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意义的发展变化与大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变化中的语言是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表现形式和表达工具,因此,意义不是表意手段的游戏结果”(史忠义,1994,p.41)。从作品论和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一观点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但是,作为一种1968年的“五月风暴”的产物,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体现了改变一切先例,驳斥一切常规的反传统的特征,我们无法否认她的这种理论建构尝试“将非理性的因素纳入到本身充斥着理性的符号学研究中,从而来呈现符号学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张颖,2014,p.28)的学术努力。她的符号学理论在打破和扩展符号学研究的边界层面,是有不容忽视的价值的。

三、从实践到意指实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实践”一词集中出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文本中,后来马克思使用“实践”一词的地方并不多,他主要关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再生产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995,p.57)实践在此指在哲学家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改造世界的广大领域。他将人看成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着重阐释了人的实践本

性，对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科学解释。马克思将实践看成是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995，p. 54）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既把自身与其活动对象的指向区分开来，又实现了二者的统一。马克思是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如何生产自己的生活从而创造社会历史的视角来考察实践的。

马克思以改造旧的唯物主义观，为工人运动提供理论指导为旨归，提出一种新的唯物主义观。这一观念将客观世界看成是改造的对象，并将主体能动性提出来，强调从实践出发理解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试图通过实践来认识和改造社会。马克思的这种实践观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实践，他为哲学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将哲学变成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克里斯蒂娃在她的符号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对马克思的实践论进行了再解读。克里斯蒂娃的实践观包含了社会实践和文本实践两个维度。首先她对马克思主义体系下实践的客观性和逻辑性提出了疑问，认为这种马克思的实践论在一种程度上消解了“主体的紧凑性和自我存在”，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所有实践的指导方针上都强调外在性、客观性和真实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指出了实践的客观性和逻辑性，因而引出了实践的境况和结构而不是实践在主体间以及主体内部的运动。”（Kristeva, 1974, p. 179）克里斯蒂娃认为在马克思的实践观中被忽略的问题是“实践在主体间以及主体内部的运动”。

鉴于此，她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没有强调实践的‘行动的主体’，而转向了一种没有主体的实践理论。只有毛泽东思想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有限的实践概念，而强调了‘个体体验’。”（Kristeva, 1977, pp. 129 - 130）从她的这一论断可以看出，她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并未越过主观性的暗示，而毛泽东在《论实践》中的实践观明显在个体体验层面有突破。

她指出：“毛主义强调了实践的两个方面：必须是‘个人的’且需要‘直接经验’。”（Kristeva, 1977, p. 130）毛泽东的实践论强调了实践与主观性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实践以“实践理念”的方式存在，而主观性是社会变革和革命背后的推动力。毛泽东的实践观，被克里斯蒂娃用来作为自身实践论建构的铺垫。克里斯蒂娃与巴迪欧、齐泽克等其他多数西方左翼理论家

一样，尤其重视并凸显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中的个体体验以及主观性，并将其看成是毛泽东实践论的核心内容，认为正是这种个体体验和主观性成了调动个体积极参与社会改造的动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克里斯蒂娃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的解读，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个人化的倾向。她对毛主义的理论认知，是建立在对大量理论文本的处理之上的，并未立足于理论产生的复杂社会语境，而是仅仅根据自身体验和理论建构的需要来进行选择。

建立在对马克思和毛泽东实践观的解读基础上，克里斯蒂娃提出她倾向于将实践看成是一种意指活动，即意指实践。克里斯蒂娃的导师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在他的《文本理论》(*Textes*)中认为：“意指实践首先是一种已分化的意指系统，依赖于一种符号的类型学，而不是符号的一般矩阵……于是这便是一项实践；也就是说意指在其中产生。而且这项实践并非像索绪尔所假设的是在抽象的层面的意指（如语言），而是倾向于操作的层面的意指。这个意指同时也关乎一项任务，在其中社会语境下主体和他者斗争的特有运动发生转化。”(Berthes, 2002, pp. 447 - 448) 克里斯蒂娃与巴尔特在对意指实践的界定上是相似的。克里斯蒂娃所谓的意指实践同样关注意指系统的分化，与抽象层面的意指不同，侧重于操作过程。同时，通过这种意指实践，社会语境下的主体和他者间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斗争运动。为描述社会语境下主体与他者间的斗争关系，克里斯蒂娃将语言系统和社会实践相联系，为二者构成一种同构关系，并将社会实践看成是一种符号活动。以此为前提，社会实践与主体之间就能实现她所追求的一种更深层次的互动：主体在社会实践中体验各种异质对抗，也面对各种驱力所带来的新的实践可能。

而其所提出的文本实践则是一种更个人化和过程化的实践，但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这种密切关系的依据是“连接文本的再现体系也根植于社会活动之中，甚至社会革命阶段之中”(Kristeva, 1974, p. 174)。文本实践将异质对抗、贱弃以及驱力等各种实践体验带入这种特殊的意指实践中，并将这些体验引入到“根植于社会象征的指示之中”。与社会实践相比，文本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克里斯蒂娃认为，是可以通过语言的“留白”邀请读者进入这一实践过程，因而它不仅是一个过程中的实践，同时也因为质疑了象征的有限性，从而成为一种新的实践，而最典型的文本实践则是先锋文本，如马拉美、洛特雷阿蒙的先锋诗歌。

四、结语

在《文本与文本科学》一文的开篇，克里斯蒂娃提到“把语言变成一种

工作” (faire de la langue un travail) (Kristeva, 1969, p. 9), 而语言的工作则具体呈现为表意手段, 即能指的实践行为。这项工作穿越语言的系统, 同时在语言的结构中拒绝既定的社会符码, 挑战主体以及主体所引入的社会整体。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并不是到符号系统外部去寻求解构符号系统的力量, 而是从否定符号系统内部的封闭性和静止状态开始, 抓住内在于符号系统的动态的符号生成过程, 来为符号系统注入动力。

克里斯蒂娃发现了封闭的符号系统所存在的局限, 于是将这种系统抛弃掉, 将不同的科学研究模式吸纳进来, 同时更新这些科学的专业术语的固定含义, 赋予它新的内涵, 旨在将研究从内部向外敞开, 将符号系统从过分理据、纯粹和秩序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在她“激进”的符号学理论中, 对其他被吸纳进来的科学术语的创新性的、个人化的使用, 成为克里斯蒂娃用于挑战和颠覆陈规的途径。回到理论产生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 词语层面的革命在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屡见不鲜, 甚至成为知识分子进行反抗的一种常用武器。“知识分子等都处在一种无法摆脱的修辞混乱里混合, 人们在谈论行动、理解词语、解放自己, 为议论而议论, 带来一阵浑浊的激烈的雄辩潮流。”(若弗兰, 2004, p. 164) 克里斯蒂娃对已有的术语的创新使用正是这种通过词语掌握权力来实践暴力的行为。但不得不指出, 她对马克思术语(劳动、生产与实践)的深入解读, 是一种词语掌权的途径, 但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反抗的姿态。

从马克思到克里斯蒂娃, 生产和劳动概念发展成意义生成的概念。生产的功能目的性被抽空, 劳动成为符号层面的仪式, 它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最终被符号的形式所取代。劳动的内核被抽空为一种劳动的系统, 传统的符号学所关注的符号系统内部各个部分的情况和相互关系, 让位于被劳动的系统所掩盖的, 发生在能指层面的意义生成和意指实践。

克里斯蒂娃提出意义生成概念, 与其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借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找到新的突破点, 不如说是从与马克思并行不悖的另一个切入点去探讨生产、劳动和实践的概念。同时, 不可否认, 克里斯蒂娃对马克思的研究视野和思维方式的继承是显而易见的, 二者都是探索表层底下隐藏的深层次的内容, 且均是通过对理论的探索和改造来观照现实, 知识分子对世俗世界的关怀成为理论建构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是巨大的知识宝库, 对于后世的理论批评家理论的建构有重要的影响。作为符号学家的克里斯蒂娃, 与西方多数左翼知识分子类似, 有“借他人酒杯, 浇自己块垒”之嫌, 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成为借用的对象, 理论建构过程中克里斯蒂娃论

□ 符号与传媒 (13)

证逻辑的严密性和立场的合理性是有待商榷的。这或是这类知识分子理论建构的“捷径”，亦可能是不自觉地理论探索的道路选择。然而无可否认，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跃度和包容性。

引用文献：

- 波德里亚, 让 (2012). 象征交换与死亡 (车槿山, 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 黑格尔 (1983). 精神现象学 (下卷) (贺麟, 王玖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马克思 (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19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若弗兰, 洛朗 (2004). 1968年5月法国的“文化大革命” (万家星, 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 史忠义 (1999). “文本即生产力”: 克里斯特瓦文本思想初探. 外国文学研究. 4, 33-41.
- 郗戈 (2014). 从黑格尔到《资本论》: 现代性矛盾的调和与超越. 学术月刊. 4, 37-46.
- 张颖 (2014). “符号心理分析”: 建构一种新的意指形式. 当代文坛. 3, 25-28.
- 赵毅衡 (2011).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Barthes, R. (2002).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 Paris, FR: Seuil.
- Kristeva, J. (1969). *Séméiôtiké.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Paris, FR: Seuil.
- Kristeva, J. (1974).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L'avant-garde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Lautréamont et Mallarmé*, Paris, FR: Seuil.
- Kristeva, J. (1977). *Polylogue*. Paris, FR: Seuil.
- Kristeva, J. (1986). *Semiotics: A critical science and/or a critique of science*. In Toril Moi (Ed). *The Kristeva Reader*.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张颖, 博士,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理论符号学、叙述学。

Author:

Zhang Ying, Ph. D., lecturer of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semiotics and narratology.

Email: zhangying1989726@163.com